

钩 沉



阴历癸卯兔年即将过去,甲辰龙年在望。中国人对于龙的图腾崇拜源远流长,伴随着五千年的岁月变迁,“龙文化”深入到中国文明血脉中。今天,海内外的华人无一例外地把自己视作“龙的传人”。“龙文化”张扬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贯注着中华民族亘古及今的文化认同和种族认同。

关中娃娃「移尿窝」

在关中农村,娃娃满月后要出门转一下或小住几日,俗称“移窝”“挪窝窝”“移尿窝”或“挪尿窝”。“移尿窝”有“小移窝”和“大移窝”之分。所谓“小移窝”,就是在娃娃出月当天,由爷爷奶奶抱着其到打麦场里转一圈,或在当天午饭前由娃娃的父亲(如父亲不在家也可由其他男性长辈代替)抱着娃娃到牛槽里放一会儿,到书桌前走一圈,祝愿娃娃长大后身强体壮,勤耕苦读,耕读传家。接着要抱娃娃到祖父的房子待一会儿,以表示娃娃长大后不忘本,成长过程中会得到庇护。

所谓“大移窝”,就是指娃娃满月后要剪去一段时间的胎发。在西安周边农村,“移尿窝”的时间一般是在娃娃满月(出月)以后。去舅家之前,爷爷奶奶要往娃娃脸上抹点凡士林,意思是“黑娃”变“白娃”。具体做法是先在娃娃的眉心抹“黑路”,俗称“打灶勾”或“打皂狗”;回家时要抹面粉,舅家要用白面蒸“莲花馍”,给娃娃脖子上挂五色丝线绑铜钱一枚,外婆或舅家人用面粉在娃娃眉心上抹“白路”,希望娃娃长命吉祥。还讲究回家后将“移尿窝”时从舅家带回来的馍拍碎喂狗吃,这样娃娃就不会“变狗”(农村人把娃娃生病叫“变狗”)。娃娃满月后第一次去舅家,要带馍回来,就是娃娃娃娃一生都会有充足的食物。

人道是“十里乡俗不一样”,咸阳与西安虽只有一河之隔,风俗却有差异。咸阳一带娃娃“移尿窝”时抹点锅灰,一般在舅家住8天,最长9天,但不能少于3天。回家时给娃娃抹点白粉,舅家要给娃娃一个用红线拴着的铜钱,戴在娃娃脖子上。

同在关中道上,东府渭南与西安、咸阳的风俗更有明显不同。渭南周边把“移尿窝”称作“熬满月”,娃娃一般在舅家住一个月。韩城一带,娃娃满月当天,就要和母亲一起去外婆家,是男孩婆家送去,若是女孩则是娘家来接,半个月或20天后,娃娃由父亲接回。在合阳,娃娃满月后要回舅家住40天,回家时,舅家要给娃娃带回“全身馄饨”。所谓“全身馄饨”,其实就是一个个娃娃头形状的“小馄饨”(花馍),用红线穿起来挂在娃娃脖子上,表示对娃娃的美好祝福。“全身馄饨”一般为25个(5个大的表示娃娃的头和四肢,即“五体”,20个小的分别代表娃娃的10个手指头和10个脚趾头),而合阳西北乡的“全身馄饨”数量则要与娃娃母亲的年龄相同。韩城娃娃“熬满月”回家时,外婆要给外孙蒸“串串馍”,即把馍做成手指状,用线绳穿起来,随外孙带回家。

在西府岐山,娃娃“移尿窝”却是另一番景象,一般在娃娃40天左右,母亲才带着娃娃回娘家“挪尿窝”。去时要给娃娃怀里揣一个馍,意为带粮,不让娃娃受饥挨饿;同时给娃娃“打皂狗”,即在娃娃额头上涂抹锅底上的灰作为标记,意思是把娃娃弄脏就不会被妖魔鬼怪偷走;还要给娃娃身上别红针线,意思是把娃娃的魂魄缝在身上,邪气难侵。到了舅家,还要把娃娃放到牲口槽里打个滚,寓意娃娃长大后力大如牛,能耕善跑会负重前行担大任。回家时,外婆要给外孙蒸“曲联馍”,给外孙眉心涂抹红色“皂狗”、系“百锁”,祝娃娃长命富贵。

总体而言,关中农村对于“移尿窝”从舅家带回来的馍,不论是锅灰还是蒸馍抑或是“曲联馍”,娃娃的爷爷奶奶或父母都要将其切块,分给邻居享用。这是关中人普遍认为,一个娃娃的成长要仰仗乡邻的爱和帮衬,有好吃的要大家分享,不能吃独食,以免娃娃日后在遇到困难时,失去寻求帮助的机会。

人生难得隔辈亲,娃娃是爷爷奶奶的心头肉,也是外孙外婆的心尖尖。“移尿窝”,移的是后继有人的满心欢喜,移的是“坐月子”的哺乳艰辛;收的是娃娃平安成长的美好祝愿和母亲身体健康的真挚祝福;分享的是远亲近邻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浓郁烟火气。淳朴的乡情,温馨的风乡,在“移尿窝”中相互传递、交融,成为民族薪火相传的最富鲜活生命力的载体。

民俗

中国古诗赋中的龙意象

它不仅根植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而且也成为古今诗人吟咏不绝的题材。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龙,有一个从“物象”到“意象”的生成和抽象过程。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龙,龙究竟为何物?在中国古籍记载中,龙是确有其物的。许慎的《说文解字》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意思是说,龙是一种带有鳞甲的动物。《周易》中有“飞龙在天”和“见龙在田”的记载。还有专家认为,中国远古文字中没有“鳞”字,因此被称为“龙”的动物,很可能就是巨型的鳄鱼。这些记载表明,在远古时期,确实有一种形体较大的爬行动物,人们可以用来畜养,而且将之与氏族承继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应该就是“龙”图腾的起源。也就是说,从将“龙”的性格特征与氏族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时起,就完成了“龙”从“物象”到“意象”的抽象和升华,使之成为一种象征性,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在中国古诗词中,以“龙”为题材的作品琳琅满目,精彩纷呈。

早在先秦时期,从《诗经》到《楚辞》,诗人们就扇动想象的翅膀,铺排龙的吞吐,讴歌龙

的神圣、吉祥。《诗经》中写道:“蓂莪萧萧,零露漙漙(ráng róng)。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说自己在艾蒿葱茏、露珠摇曳的季节见到了“龙”的化身周天子,他的品德高尚,祝福他万寿无疆。又如《诗经·酌》说:“於铎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蹇蹇(qiǎoqiǎo)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酌》是《大武》曲中的一首,歌颂周公平定叛乱的功绩。这里“我龙受之”中的龙就是指的“周天子”。《楚辞》中的“龙意象”更加诗化,有专家经过统计,《楚辞》中的“龙意象”达到43处,如其中“神龙”被用来隐喻德行高尚,不同俗流的君子和贤者。诗人感叹:神龙离开水到了陆地上,就要受到蚂蚁的欺负;神龙都是这样的遭遇,何况贤者呢?

汉魏时期,在大量的散文特别是赋文中,“龙意象”除了与皇权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外,成为内涵更加丰富的喻体。当我们读司马相如《上林赋》时,不禁被作者笔下“凌三峻之危”的秀美山川所陶醉,更从中读出“龙”意象的铺排。“于是乎蛟龙赤螭”“青龙蚺(yóu liú)于东箱”,前者是作者想象有鳞的蛟龙与无鳞的叫赤螭(chì)的龙与群鱼游于水间,后者以“龙”喻马。东汉著名散文家班固的《两都赋》中写道:“黄龙之瑞,以为年

纪。”在中国古代,“黄龙”代表着好运和福气,因此在庆祝和祈福活动中常常以黄龙为主题。汉宣帝以“黄龙”为年号。班固在《两都赋》序言中还描写了汉朝“福应尤盛”的文化氛围,最好不过地说明了“龙意象”与中国传统国民心理的关系。

在唐诗宋词中,“龙意象”进一步被精神化、人格化和符号化。一是如杜甫以“龙意象”寄托自己的忠君思想。“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对传统“龙脉”文化的坚守。二是李白以“龙意象”象征大自然的壮观,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写道:“熊咆龙吟殷岩泉”,“飞瀑流泉,龙吟熊咆,深林巖峰跃然之上。三是白居易笔下被赋予文化批判寓意的“龙”,诗人写“龙”“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盆冷”,然而,人们虔诚呈献的供品,却“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四是宋代诗人陆游笔下作为大自然力量的“龙”。《龙挂》一诗中,面对“成都六月天大风”,诗人倏然联想到“上帝有命起伏龙,龙尾不卷曳天东。”用现代科学理念来看,作者所描写的,应该是“龙卷风”这种自然现象,充分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 □杨焕亭

往 事

“七子之家隔两行,十全归一道沧桑。五湖四海盘中算,三教九流珠上忙。”这首中国古代的算盘诗,形象地描述了算盘的特点、特征,以及算盘在中国社会应用的广泛。

中国的珠算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有关文字和实物记载,算盘发展到宋代,其形制、计算方法已经和现代算盘基本相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之后,它便成为中国人的主要计算工具。中国的第一艘铁甲巡洋舰、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其核心数据,都是科学家们用算盘打出来的。算盘,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对农业、工业、商业、科技、文化、数学、音乐等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计算机的普遍使用,算盘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算盘文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为了使算盘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榆阳区政府于2021年建成了收藏算盘最多的“中国算盘博物馆”,供人们参观、学习和研究。2024年元月,中国算盘博物馆组织八位具有算盘文化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员,开展“传承算盘文化,共筑智慧家园万里行”调研活动,寻找算盘记忆,记录算盘故事,整理、挖掘和宣传算盘文化,我有幸参与其中。

此次调研走访的第一站便是当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曾经住过一百多天的米脂县杨家沟村。

杨家沟村,位于米脂县城东南20公里处。村内建有的马氏庄园,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是陕北地区最大的地主庄园。

1940年前后,杨家沟一共有270余户人家,马氏地主就有72户,拥有土地十几万亩。马氏家族拥有的不只是土地,还有智慧,他们很重视教育,马家发家的始祖马嘉乐曾经创办3所私塾,供子孙、亲友和乡邻子弟读书考取功名。

马氏家族以经营农、商为主,注重教育,所以他们在米脂、绥德等地开设有许多字号,所有的账目都要用算盘计算。居家务农的,每一家院落都有堂号,雇用大量的佃农为其耕种或租佃耕种,收取地租,来往账目也需要用算盘计算。孩子们在私塾读书,开设有珠算课程,每个孩子都要有一把算盘,村里的大人、小孩,大部分都能打会算。采访中,七十九岁的马氏地主后人马均,拿起一把算盘说:“几十年都不打算盘了,忘得差不多了。”但他拨拉着算盘,背着珠算中难度最大的除法口诀,给我们讲解了除法最基本的打法。

纪念馆副馆长刘霖霞向我们讲述了杨家沟“算盘闹革命”的故事。1941年,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规定,掀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杨家沟作为一个土地矛盾对立非常严重的典型村寨,引起了张闻天的注意。张闻天率领调查组一行九人,于1942年9月26日进驻杨家沟,至11月21日离开,开展了为期56天的调查研究。

张闻天在调查中特别强调“只有亲自动手得来的材料,才是比较可靠的”。为获得第一手资料,张闻天不仅召集各阶层人士召开座谈会,还多次走访村内及邻村的农民与干部,与他们促膝长谈。他分别于10月10日、11日先后向农民刘成元、刘树荣等了解家庭生活以及租种马家地主土地的情况。之后,张闻天拿出5天时间,向杨家沟地主集团代表人物马维新了解自种、伙种、安种,经营字号生意买卖以及雇工的情况。通过一问一答,马维新主动说出自己经营发家的过程,对话交流中张闻天耐心地听取了马维新关于自己家世的介绍。当他得知村里最大地主马维新家保存着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直到当时近百年的大量购地、典地、收租、放租、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簿以及文约后,张闻天喜出望外,立即让人前去商借,马维新是一位开明地主,他把自家所保存的账簿以及文约全部拿出来给调查组,任凭张闻天他们研究。面对堆积如山又梦寐以求的资料,张闻天如获至宝。他不分昼夜一本一本本地详细翻阅,调查组一道一道核算。马洪打算盘,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则帮他抄写数据、材料,一忙就是几十天。除了马维新的“账本子”,调查组还搜集了其他地主(如马瑞唐)的“账本子”、米脂县志、碑记等书面历史材料,他们将所搜集到的米脂县志以及在当地“功德碑”上得到印证的灾灾闹荒的历史如实写进了调查报告之中。

在杨家沟的56个日日夜夜里,张闻天来回遍访杨家沟村家家户户了解情况。在张闻天的指导下,调查组又进行了综合分析、修改补充,全面分析了当时的经济、生活、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思想动态等。调查报告由马洪拿出初稿,后经张闻天反复修改而定稿。《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报告》以翔实可靠的材料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与掠夺土地,同时详细介绍了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情况。报告深刻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规律,成为国内外研究地主经济史的珍贵历史文献。它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夺取解放区和全国土地改革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资政作用,也成了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光辉实践,被誉为中国社会新的“资本论”。杨家沟村的老百姓说,小小的算盘,算清了地主家的所有资产,算清了地主家剥削农民的发家史,也算清了农民所受的剥削,这是本村的第一次“算盘闹革命”。

时间推进到1947年,陕北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土改工作组和贫雇农代表,用没收地主的算盘,详细清算地主的田地、资产,又用算盘做计算,把地主的田地、家产合理地分配到了农民的手中。群众称这是第二次“算盘闹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马氏地主成员大都离开了本地,但他们的算盘却一直在本乡发挥着作用,历经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改革开放初期等历史时期,直至本世纪初才被计算量取代。老乡们说,他们村原来家家户户都有算盘,有的还有好多把,后来都不用算盘了,有些已损毁,有些被当作老古董,卖给了来村里收购算盘的人。我们了解到,被誉为全世界收藏算盘最多的算盘收藏家赵占明先生,曾于2000年前后,在米脂县杨家沟和附近村镇收购到2000多把算盘,一部分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算盘,一部分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算盘,其中部分精品现已展陈在榆林市榆阳区夫子庙“中国算盘博物馆”。

马氏地主的算盘,曾经为盘剥农民、用以发家的重要工具,也曾为革命者清算他们罪恶过往的工具。现在,它带着回不去的过往,抹不去的记忆,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供人们观赏、研究和思考。 □马绥生

杨家沟村的算盘记忆

陕西锅盔



武功锅盔

“陕西八大怪”中有一怪“锅盔像锅盖”,更让陕西锅盔美名传。

锅盔不仅在关中受欢迎,也是整个西北人们喜欢的食物。关中农村烙制出的锅盔“径二尺,似锅盖”,被称为陕西八大怪之一。刚出锅还热气腾腾的锅盔,夹上几筷子绿辣子,三两口便能吞下。关中汉子性格豪爽,嚼个三五块,才觉得过瘾。

锅盔,谐音“郭魁”,即城邦中的第一,彰显了秦人的自信。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天下,气吞万里如虎,生猛的秦军食过;汉武帝远逐匈奴,打通河西,一展雄汉风采,凯旋的汉军食过;唐太宗东征西讨,平定中原,开启贞观之治,威武的唐军也食过。

锅盔很管饱,作为战时储备粮最合适不过。由于秦实行的是“战民一体”的策略,士兵上战场要自备盔甲武器,据说那些

秦 味

家里穷买不起好盔甲的秦兵,就会在上战场前准备两个锅盔,用牛皮绳穿起来,一前一后搭落在肩膀上。又硬又厚的锅盔像盔甲一样能防身,关键时还能替盾当箭牌,扎在锅盔上的箭,拔下来还能为我军所用。

锅盔在制作过程中,会用文火将水分烘干,所以保质期较长,适合战场上携带。秦人久居关陇,和戎狄相处,饮食习惯也更贴近。秦统一六国后,将大量的六国贵族移民到关中地区,由于长期打仗,关中的存粮不够数十万移民食用,秦始皇就让人做了大量的锅盔,作为迎接六国贵族移民的第一顿饭,锅盔焦香酥脆的美味一下打动了这些从来没有吃过面食的人。从此,面食从关东传遍整个北方,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在关中各地大小街巷信马由缰地走着,偶尔会碰到某个沿街摊点或巷口老店,摊主会将锅盔和手工馍、托托馍等摆在一起售卖,而有些店里一般将锅盔作为辅助,主打水盆羊肉、羊杂汤等西北风味吃食。当然,也可以在周末三五好友,去山村寻寻乡愁,农家乐里一般有时令野菜夹锅盔这道美食。

在陕西,乾州、岐山、武功、凤翔四地锅盔最为盛名,泾阳、长武、扶风、白水的锅盔也是当地特产。虽然有椒盐、葱香、五香等口味,但陕西锅盔最主要的还是突出小麦的麦香。锅盔只需夹上一勺油辣子,就能让平实的锅盔灵光乍现,若能夹点绿辣子或者八宝辣子酱,那滋味,那口感,绝了! □杨洋

考古专家解谜团: 这顶金冠或系武则天所供奉

拂去岁月尘埃,揭示文物面目——30多年前在西安出土的一批不知其用途的唐代金花饰片,如今在考古专家的缜密“探案”中被破解。“这些金饰片是金冠的残片,这顶金冠应该就是武则天供奉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涛教授表示,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形象史学》。

据徐涛介绍,这批金饰片数量较多,且已散乱,可分为二大类型。一类是完整成形且有一定厚度的金片,依其形状为桃形、鸡心形、扇形金饰;另一类为轻薄且非完整的碎片、饰件,有梅花、六角形金箔,还有大量破碎零散的金、银、玉石、珍珠质地小饰件。这些金饰片前期不明其用途,收藏单位将其定为唐代妇女所用装饰品,依据的是200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东郊发掘的唐太宗司马师微夫人墓出土的冠饰一组,冠饰为其夫人裴氏所有;另一组冠饰为2013年隋杨帝萧后墓出土。西安仪仗厂出土的金饰在形制及组件种类上与前两者高度相似。

徐涛表示,中国古代一般以质地是否高档为重要的评判标准,金银则比其他材质的高档;另外,“钿”指的是镶嵌工艺,不光是首饰,高等级的器物上也都是惯用的装饰,这批金饰总体装饰华美、制作精工,即文献所言的“金钿宝钿珍珠装”,是高等级的女性装饰用品。“花树就是礼冠上的‘花朵’,它不是一朵花,而是一棵‘树’。”徐涛指出,这批金饰六瓣花与六角形金箔片以及银丝在萧后及裴氏冠上均有发现,不过质地均为铜质镀金。另外,金饰中的长条勾形饰件,应为文献记载的“博鬓”,而桃形、鸡心形饰件应为“宝钿”。隋唐贵妇礼冠由博鬓、花树及宝钿构成,萧后冠、裴

氏冠及西安仪仗厂出土的冠饰均有这三要素,现今萧后冠较完整,它就有二博鬓,12宝钿,及13棵花树,与文献记载的皇后礼冠基本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礼冠无论是以皇后礼仪下葬的萧后,还是包括太子、亲王级别的,其礼冠虽花树、宝钿数量不同,但质地均为铜质镀金,无一例外。西安仪仗厂出土冠饰的金银质地相比较来说,明显更高。

系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制作 为目前所出土礼冠中等级最高

西安仪仗厂出土的金冠是哪个年代?徐涛表示,缺少直接的纪年证据,需要寻找其他旁证。从现今礼冠出土的情况看,礼冠总体上盛行于高宗至玄宗前期。徐涛指出:“西安仪仗厂出土的金冠从形制到饰物与裴氏冠最为接近,不仅均有逗号形宝钿,而且均以花枝围绕主花装饰布局,特征十分明显,所以西安仪仗厂出土的金冠制作时间应与裴氏冠(长寿二年下葬,693年)相去不远。”

综合以上的研究,徐涛认为这一顶冠是隋唐时期贵族妇女的礼仪用冠,较大可能性在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制作,为目前所出土礼冠中等级最高者,显示拥有人具有极高的地位,不排除皇后的身份。

见证周时期 政治和佛教关系的重要实物

要确定是不是武则天的供奉,还需要地点的依据。而最终出土的地点定为武则天时期最重要的崇福寺,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武则天的供奉。

“从金冠的等级看,北周皇后、安乐公主、昭成皇后或都有可能。不过,从金冠残片出土地点看,基本上与这几位无关。依祥瑞内现可确定的是李静训墓。”尽管金冠出土具体位置不详,但由于西安仪仗厂厂区在大庆路以北,只有位于坊东北侧的崇福寺符合这个条件。

为何供奉金冠?徐涛介绍,武则天崇佛,在为皇后及称帝期间,除动用政府的力量来兴办佛事外,多以个人身份对包括



西安仪仗厂出土的桃形金饰。



鸡心形金饰。



扇形金饰。

崇福寺在内的佛寺、道观施以捐助支持。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服袈裟,御明堂,天授元年(690年)九月称帝,改国号为周。这样,武则天就不再以儿媳的身份现于礼仪场合,而改用袈裟。徐涛表示,在此时,武则天将象征皇后身份的金冠供奉在自己的皇家功德寺院——崇福寺。

金冠怎么就被埋藏了?徐涛认为可能与唐武宗皇帝昌黎佛有关。从出土情况可见,金冠已散乱不全,埋藏于一个中唐时期的小缸内,上盖两块砖。这种埋藏方式,显然与金银等级及佛教供奉方式不符,应当是一种匆忙草率的行为,所以金冠有可能是在崇福寺损毁时埋藏。

综上所述,徐涛推测金冠可能是武则天所供奉,是武周初期政治和佛教关系的一个重要实物见证。 □张潇